

聚焦话题：中东与国际体系转型

## 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现状透视法国的移民模式<sup>①</sup>

[法]多米尼克·马亚尔

**摘 要：**法国季节性人口迁移由来已久，且迁移的地域遍及欧洲。欧洲国家对人口迁徙情况进行清查和评估始于180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当时实行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制度，其用意在于保证拿破仑军队充足的兵源，这与后来共和政体实行的“属地主义”原则相对立。21世纪初，移民问题成为法国对内政策面临的一大挑战，它与公共安全、国民身份认同、就业市场、欧盟公共事务政策的制订以及在第二代移民中实现法国模式的“共和”与“非宗教化”的融合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欧洲国家之间与欧洲国家之外的人口迁移引发以下问题：欧洲居民的原国籍问题、法国国籍问题、法国公民权的行使问题以及在重组后的家庭种族构成愈加复杂的条件下个人身份的构建问题等。

**关键词：**法国穆斯林；移民融合；伊斯兰研究；中东与欧洲；移民研究

**作者简介：**多米尼克·马亚尔，博士，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管理交流学院副院长，巴黎第十二大学“国家发展与经济社会活动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2-0020-09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据官方统计，2009年迁入法国的合法移民为95000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5%。这一比例低于如德国、英国或意大利等大部分欧盟主要成员国。根据2005年前后发布的一项统计报告，当时法国移民总数达到490万。尽管调查难度很大，法国移民部还是估算出通过非法途径入境的移民人数约在20万~30万人之间。这一数字与欧洲国家总体情况大相径庭，后者的非法移民数量基本与合法移民数量持平或者略低。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间有130,300名移民获得法国国籍，反映了1994~2000年间每年入籍的外来移民数量保持较为稳定。

法国现代国籍权利法律的制订和颁布源于共和制度：1790~1791年间，《宪法》对法国国籍加以定义；1790~1795年间，规定两种取得法国国籍的方式：荣誉公民和自动入籍。1803年国籍法规载入《民法典》，其定义是建立在血统主义基础之上，而非《民法典》的制订者拿破仑·波拿巴所希望的属地主义原则。事实上，只是在1803~1889年这段时期，属地主义原则才逐步成为法国本土国籍定义的基础。1889~1940年间，由于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影响，法国人口急速减少，共和国政府施行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旨在吸引移民劳工定居法国，从而阻止低出生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但为应对日益膨胀的德国纳粹势力对法国的威胁，

<sup>①</sup>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曹德明教授推荐并译审、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刘常津博士翻译。

国家必须再次进行军事动员，“低谷人口”<sup>①</sup>意义可想而知，反映了一战中在法国的中国劳工无疑是推动新移民政策实施的有利因素之一，并形成了第一次移居法国的中国移民潮。

正如帕特里克·韦伊所言<sup>②</sup>，维希政权在德国占领期间所施行的种族主义国籍政策的标志是1940~1943年制订的一项新的法国国籍法规，但最终由于德国占领当局的否决而流产。这项法规的内容包括阻止“不受欢迎的人”成为法国公民，并剥夺那些已取得法国国籍的“犹太”人国籍。但二战刚结束时，废除维希政权的有关“法律”绝非易事。乔治·莫科在法国解放时主张的种族划分标准无异于在可获得国籍者中实行“配额制”。这一制度虽屡遭非议，却直至新的《国籍法》制订后才被废止，即1953~1973年间自由主义的入籍政策推行时期。<sup>[1]97-163</sup>第二次有关法国国籍的种族危机源于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政府在十年间（1974~1984年）制订各项法律，旨在保证在法国居住的北非移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外来移民第二代的同化，从而应对国籍问题引发的现实挑战。<sup>[1]165-181</sup>

以往学界普遍将以属地主义为特征的法国国籍制度与完全以血统主义为基础的德国国籍制度对立起来，历经三场波及两国的磨难，直至二战结束以来60年的持续和平，上述理论观点的对立早已丧失了其政治价值。首先，在一个统一的德国共同生活的渴望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产生。恩斯特·勒南<sup>③</sup>认为，两德之间自由来往的实现，其实就是“每天都在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德国的最终统一确实是按照法国式的“政治”国家模式实现的，并非如约翰·高特弗里德·冯·赫尔德<sup>④</sup>与约翰·哥特里博·费希特<sup>⑤</sup>所憧憬的那样，以“种族和文化”的名义实现的，这种理念最早体现在马丁·路德于1520年发表的《致德意志贵族书》中。阿尔弗雷德·格罗塞<sup>⑥</sup>强调欧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实体，既远远没有达到，却又远远超越了一种联邦政体”<sup>[2]234</sup>。即便不考虑欧盟的政治因素，就欧洲“元国家”的归属问题而言，政府、党派和媒体实际上从不触及欧盟有关条约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欧盟成员国中外来移民的国籍问题。与19世纪的美国和加拿大类似，欧盟成员国的法律要么受到法国《民法典》的血统主义影响，要么受到英国法律的属地主义影响。帕特里克·韦伊认为，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中，“英式”的属地主义能够保证外来移民的后代自出生之日起即自动获得加拿大或美国国籍。<sup>[1]206</sup>欧洲大陆国家多为移民迁出国家，“法式”的血统主义能够保证侨居国外的移民及其后代保持与母国的联系。由此可见，英国和爱尔兰尽管曾经是“属地主义国家”，但实际操作中却未必十分严格。当大量外来移民迁入时，两国政府加入血统主义的法律条款，以此维持侨居海外的国民与母国的法律关联。因此，当有关国籍的法律与移民形势的构成产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机械性的，而是根据不同国情，经过国内政治辩论和依照一定程序方可实现的。<sup>[3]</sup>

1945年11月2日，法国政府颁布法令明确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目的是鼓励侨居国外的欧洲裔移民向法国迁移。阿尔及利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作战，阿尔及利亚籍穆斯林由此也就享有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自由往来的权利。根据定居法国本土即为法国公民的“自动同化”原则，已获得法国国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无需再申办入籍手续。法国当局各部门在移民的组织方式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此保证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本土的生存权利。原则上看，作为法国公民，

① 此处法语原文为“classes creuses”，指在出生率异常低的年份出生的人。

② 帕特里克·韦伊（Patrick Weil，1956~）：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③ 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

④ 约翰·高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年）：德国作家、神学家和诗人。

⑤ 约翰·哥特里博·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德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

⑥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1925~）：出生在德国的法国当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阿尔及利亚裔劳工并不需要接受法国政府任何的监管。但法国内政部与劳工部还是在由谁来主导外来移民的管理事务上产生了矛盾，由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所带来的问题牵扯到法国政府的不同部门。

## 二

针对法国移民问题，政治家阿兰·朱佩曾指出，对于生活在其领土上的 400 万穆斯林移民，法国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sup>[4]</sup>从历史角度看，法国始终保持着与穆斯林世界在文化、政治和商业等方面的联系，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是重要媒介。自 19 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活动之日起，法国殖民当局就实施一套针对穆斯林宗教信仰的管理制度，法兰西殖民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被赋予任命辖区内清真寺“伊玛目”的重要权力。同时，为纪念在一战中为法国捐躯的约 10 万穆斯林战士，法军墓园中都建有符合穆斯林习俗的墓地。正因如此，法国这个曾经的殖民强国于 1926 年在首都建造巴黎大清真寺，以表达对穆斯林群体的感激。但自 1905 年“政教分离法”颁布直至 20 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本土都没有一处正式的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始终都很低，有限的穆斯林人口无法召开国家正式承认的伊斯兰教教务会议。

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与去殖民化历史在法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烙印，“1954 年 11 月 4 日事件”促使阿尔及利亚人采用的极端主义手段与法国人实施的酷刑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sup>[5]</sup>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残暴酷刑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几十年之后，依然如梦魇一般困扰着人们。“黑脚”族群<sup>①</sup>被视为对阿尔及利亚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原因是他们不做任何让步，过分在意自身利益。当年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掌权的历届法国政府，尽管因处理阿尔及利亚事件失败而相继垮台，但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居住在本土的法国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推卸掉作为公民本应担负起的政治责任，使阿尔及利亚人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sup>[6]</sup>当地穆斯林组成的辅助部队曾与法军一道镇压穆斯林同胞的起义，但战后却立刻被法军和政府所抛弃。法国就这样逐渐“患”上了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失忆症”，从拥抱、开发，到统治、掠夺、武装镇压，直至彻底放弃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sup>[7]21-22</sup>

法国当局意识到，必须大力改善在法阿尔及利亚劳工近乎悲惨的生活境遇，尤其要为单身劳工修建住房，以此消除其日益加剧的反抗情绪。为此，1958 年时任法国政府内政部长的莫里斯·布热—莫努里宣称，“阿尔及利亚族群永远都从属于法兰西大家庭”，说明法政府看待阿尔及利亚裔群体的态度已发生了改变，莫努里的真正用意在于将法国人口中的某个族群与民族主体隔开，前者融入法兰西民族的可能性也随之消散，结果导致穆斯林族群不再是法兰西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地位类似于过去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种族文化角度看，穆斯林族群都因其包含的特殊元素而变成法兰西民族内的一个“异质”集团。因此，法国内政部负责对移民进行甄别，将他们划分为“好移民”与“坏移民”<sup>[8]189-190</sup>。1958 年 10 月 3 日，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表演说时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国人，促使移民问题中的社会因素成为法国政坛的议题之一。这一时期，约有 14000 名阿尔及利亚单身劳工和 1800 个阿尔及利亚裔家庭居住在里昂、马赛和巴黎郊区的贫民窟里，<sup>[9]204</sup>住房问题成为在法阿尔及利亚移民亟待解决的难题。当时的法国政府仅关注阿裔单身劳工的居住问题，对阿裔移民家庭的住房问题未予以重视。但 20 世纪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已经引发了举家移民法国的潮流。1953~

① 这一称呼源于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时代初期此处欧洲殖民者所穿的靴子的颜色。

1960年间,家庭移民的人口数量从3000人跃升至2万人。<sup>[8]207</sup>针对迁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家庭无法申请“低租金住宅”这一问题,银行发放特别贷款用于修建与移民家庭经济水平相适应的低租金住宅,以改善在法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地位并作为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筹码。

法国穆斯林的这种特殊移民制度逐渐扩展至所有原“法兰西联盟”<sup>①</sup>的成员国,这一制度遵循的也是“光荣的30年”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它所带来的结果是法国民众自然倾向于为新迁入的外来移民谋取福利。1970年石油短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法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为救助外来移民而投入的社会补助受到影响,法国移民政策由此遭到怀疑和非议,标志着合法移民大批迁入的终结。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移民问题第一次成为源于殖民地的国内问题,它在法国政坛引发的激烈辩论掩盖了原住民与移民相互排斥的复杂现象。但移民族群为法国经济增长、促进劳动阶层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和国家的整体繁荣都做出了巨大贡献。<sup>[9]33</sup>费尔南·布劳代尔<sup>②</sup>指出,为偿还亏欠移民的债而做出些许牺牲,完全是公正的表现。<sup>[10]12-13</sup>与此同时,移民却被视为共和国政权和民族基本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在宣扬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方面具有普世意义。从实践层面来看,法国的各项移民政策建立在三种逻辑的交互点上:首先是种族逻辑,体现对政治避难者、劳动力移民及人口移民加以区分的政治理念,并为迁入者提供居住保障;其次是人口逻辑,其理论依据是法国客观上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口,从而保持或者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最后是经济逻辑,促使法国雇主倾向于雇佣可塑性强且薪酬要求低的单身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健康情况良好,有能力适应不同经济部门的差异较大的工作。<sup>[11]28-38</sup>总之,法国移民政策的制订本身包含相互矛盾的选择原则,即“参与者的国家”原则与体现共和国平均主义理念的“平等的国家”原则相互对立。

### 三

戴高乐将军曾郑重宣布:“身在法兰西,皆为法国人”,他所指的这些法国人中有一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根据法国移民融合高级委员会统计,法国现有400万~500万穆斯林(这一归类基于人口文化属性,而非根据其宗教活动划分),其中大约一半人拥有法国国籍。在法国穆斯林总人口中,约有300万来自北非或是北非移民的后代:150万为阿尔及利亚裔,100万为摩洛哥裔,其余为突尼斯裔。其他穆斯林族群中,大约有35万来自土耳其人,约25万来自撒哈拉以南国家,其余来自中东其他地区。法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移民接收国,这种形势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20世纪八十年代,反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层出不穷。这些主张大多由法国社会党发起,其成果体现在平民居住的“郊区”所建立的许多协会组织上,旨在帮助年轻的马格里布移民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并通过提供资金和服务手段,促进他们融入法国社会。但由于资源有限,许多组织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使命,反种族主义的组织网络也逐渐丧失了威信。原因是这些组织未能与私营企业主和公共领域行政负责人建立一套关系网络,而后者在促进年轻移民就业方面会起到关键性作用。面对这种失败,年轻的北非移民中充斥着失望情绪,他们曾加入社会党,并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用选票为弗朗索瓦·密特朗连任做出了贡献<sup>[12]229-241</sup>,这使得失望情绪愈发强烈。

据调查,无论是国民议会选举还是地方选举,20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穆斯林公民的选票总体上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微,因为当时只有获得法国国籍的穆斯林才有选举权。而法国市政当局为避免引起辖区内欧洲裔选民的不满,拒绝受理虔诚的穆斯林提出的修建清真寺的要求。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在选举前对年轻的北非裔选民信誓旦旦,可只要他们一旦当选,便利用市镇首长的身份,毫无廉耻地使用他们拥有的优先购买权,将本来承诺给穆斯林移民修建清真寺的土地收入囊中。这种行为违

① 法兰西联盟是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与原殖民地国家成立的组织,以此协调双方的关系,从而替代过去的“法兰西殖民帝国”。1958年,该组织被第五共和国政府建立的“法兰西共同体”所替代。

② 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法国历史学家。

背了1905年12月9日颁布的“政教分离法”，同时也与法兰西共和国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结果造成那些要求修建清真寺的穆斯林第一代移民感到十分失望，这种情绪逐渐影响到穆斯林的年轻一代，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则借机扩大其影响，并提高了在穆斯林族群中的声望。

法国殖民时代的屈辱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法军的暴行，对于定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及其在法国出生的子女，至今仍是一段痛苦而难忘的记忆。同时，“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阿尔及利亚举行隆重悼念仪式，纪念为独立事业献身的“150万烈士”，更加深了阿裔移民对那段历史的群体意识。这些死难者主要是平民，尽管“150万”的数字与实际并不符合（实际上死难者人数更接近30万），但几乎每一个阿尔及利亚家庭都受到了牵连，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持续七年的战争中遭到法军的摧残。而且，这些痛苦的记忆为“伊斯兰拯救阵线”（以下简称“伊拯”）所宣扬的敌视法国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传播环境，促使他们摒弃被视为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与《古兰经》教义相背离的西方政治制度。“伊拯”大力宣扬伊斯兰教义，借此迅速夺取了不容置疑的话语权，成为社会凝聚力的主导力量，并最终控制了阿尔及利亚政坛。

从社会层面看，“伊拯”推行一系列慈善救助措施，满足了阿尔及利亚最下层民众的要求，同时使负责分发财务和提供救助的清真寺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中心。1990年“伊拯”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市政选举的胜利；1991年又在第一轮议会选举获胜。不过，这一政治进程的顺利发展由于1992年军队的干涉而中止。在“伊拯”掌权时期，几乎每个阿尔及利亚人都有一个家人居住在法国，或者曾经在法国居住过。这一现实使阿尔及利亚人能够通过财产和有偿服务市场获取外汇。与此相对，居住在法国的每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都有亲戚或者家庭成员在1990年或1991年时投票支持“伊拯”，而这些亲戚或家人经常向他们在法国生活的亲人发泄对于1992年军事政变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伊拯”对于法国的“妖魔化”宣传及其影响由此在生活于不同世界的同一家庭成员之间传播开来，而周围环境向他们灌输的却是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可见，面向阿尔及利亚本国公民、定居法国的阿裔移民及其子女、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取得法国国籍的阿裔族群以及第二代移民的子女，“伊拯”“妖魔化”法国的政治宣传对上述群体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极为深远的。

针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文化属性”，“伊拯”采取推行“纯洁”的伊斯兰身份的激进政策，禁止一切与法国有关的知识与语言联系。通过实施文化专制政策，“伊拯”力求保持严格且只能按照伊斯兰教义重新定义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身份，从而摒弃亵渎宗教和罪恶世界的影响，“伊拯”中最为激进的派别被称为“萨拉菲运动”，以遵从古代伊斯兰教“纯洁”的传统和“虔诚的祖先”而闻名，这一派别得到部分在法国避难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后者在法国的某些清真寺中宣传其主张。萨拉菲派认为，大部分阿尔及利亚人的伊斯兰信仰受到“马拉布主义”<sup>①</sup>迷信学说、某些异端宗教活动和法国文化影响的玷污。“伊拯”力图重建信徒个体、改造社会和建立伊斯兰政权。而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出现了阿拉伯、柏柏尔、法国、马拉布、社会主义和政教分离等多种思潮的相互融合。萨拉菲派要实现其主张，必定要与这种混杂性的后殖民文化进行断然的决裂。同时，可憎的法国殖民主义所遗留的各种“毒药”中，有两种最为可怕：一是政教分离，二是民主制度。从理论角度看，“伊拯”的目的在于“敲碎民主学说的‘头盖骨’”。他们认为民主起源于对宗教的亵渎，被神视为人间的“败类”，且民主的定义是“主权在民”，这与伊斯兰教“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不符。就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环境来看，维护民主原则及其制度更加困难。尽管“民族解放阵线”曾宣称要捍卫民主，但正是它1992年依靠武力强行阻止了第二轮议会选举，中止了阿尔及利亚的民主进程。<sup>[12]234-238</sup>

继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和达尼埃尔·瓦扬之后，1999年时任内政部长和宗教事务部长的尼古拉·萨科奇亲自推动建立“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动议获得了成功。据1999年的统计，当年法国移民为430万，约占法国本土总人口的7.4%。在1/4个世纪以来这一比例基本没有变化。此外，超过1/3的移民能够取得法国国籍。

① 马拉布信仰运动是发端于公元8世纪末期带有神秘主义的伊斯兰隐士修道运动，从事者以读经、传经度日。

法兰西文化之所以具有普世意义，就在于它具有平等精神。但在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法兰西文化又是一个特殊实体，必需依靠具有特质的边缘成份，才能找到它的源头和生存的根本所在。<sup>[13]226-228</sup> 根据法国的特殊性，移民融合高级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强调“融合”的定义并非是“吸收”和“合并”这两个概念的中间地带，而是一个特殊的“进程”。按照这一定义，该委员会建议，以“个体”间平等的理念代替“族群”间的平等，并将之视为法兰西共和传统原则和特性的延续。事实上，法兰西共和“契约”首先建立在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基础之上，之后才是保障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尽管如此，共和理念的价值并未因此而降低。<sup>[14]16-17</sup> 阿尔及利亚家庭制度与法国个人至上的家庭制度之间的矛盾，加重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政治敌对情绪。阿尔及利亚人对族内通婚的倾向必定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婚姻发生冲突。法国殖民者的异族通婚和双边原则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在其所属的族群之外找到伴侣是成员的义务，因而他们必然无法接受被殖民者父系决定血统和族内通婚的做法。殖民地生活中每天都在抛头露面的法国妇女按照法国人的道德观来看代表着平等和独立，而在阿尔及利亚人眼中却是西方“野蛮人”有伤风化的表现。阿尔及利亚人心目中的“万能人”地位高于“姐妹”，只要他要求就可以立刻娶他的“堂姐妹”为妻。法国人则认为“万能人”的地位与其“姐妹”相当，他必需在族群外部寻找配偶，已经婚配则要始终与他的妻子遵守业已达成的“契约”。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两种文化各自拥有的先验原则，都将对方视为异端，这种矛盾根植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之中。正因为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无论是在阿拉伯人中，还是在卡比利亚的柏柏尔人中，所产生的异族通婚比例都非常低，如 1955 年法国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仅有 0.5% 的欧洲裔男子娶穆斯林妇女为妻，1% 的欧洲裔妇女嫁给了穆斯林。<sup>[13]294-296</sup> 如今，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族群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借助法国式的家庭模式压力，促使第一代阿裔移民尤其是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法国教育的第二代移民能够脱离阿尔及利亚传统的文化模式。为此应该正视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族群潜在的敌意，以及法、阿风俗习惯上的较大差异。

#### 四

治安与犯罪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各国都面临的难题。控制法国公众舆论的某些部门毫不犹豫地将这些问题与移民问题联系起来，理由是他们所勾勒出的“难以管理的郊区”地图与移民家庭中居住的地区重合，由此谴责外来移民及其子女参与流氓团伙、贩毒活动等。某些穆斯林年轻人被指控实施集体性的强奸活动，认为他们犯罪的动机是为了完成某些野蛮的传统仪式，其目的在于惩罚那些被“兄长”们认定为行为“放荡”、“轻浮”的年轻姑娘。<sup>[15]9</sup> 相反，绝大多数外来移民欣然接受了法国社会积极的个人激励机制，更多地考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一些年轻的穆斯林与欧洲裔的法国人组建家庭后，很快就被其配偶的家庭所接纳。不过，这种通婚行为有可能被视为一种“褻渎”行为，在法国已经导致数起年轻的穆斯林女孩遇害事件，而罪行的主谋竟然是女孩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与外族通婚是对家族的莫大侮辱。但是，并非所有穆斯林妇女都屈从于父母的包办婚姻，她们中的一些人学会了如何反抗那些侵犯她们私生活和迫害她们的不公行为，依靠如“不做妓女，也不做奴隶”等协会进行维权。

学校和教育系统是外来移民的子女接受法国价值观的最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也是外来移民子女在社会上立足，职业上获得成功，并最终实现个人价值的主阵地。特别是对于在法国出生的第二代马格里布移民中的男孩来说，情况比女孩更为复杂。前者接受法国文化和价值观意味着他在家族中原有优势地位的丧失，而后者则希望借此提高她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将自己从传统家庭模式中解放出来。正如欧洲裔的法国女孩一样，马格里布地区的第二代移民女生的学习成绩通常比她们的兄长出色，这可能是由于她们受到兄长的严厉管束，也可能由于她们十分清楚学校是自己能够在法国社会中立足的唯一机会，必需好好把握，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学校这台“社

会提升机”有时也会出现“故障”，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度较高的郊区，自 2005 年巴黎大骚乱以来，由于警察的“劣迹”或者“例行公事”的巡查，移民与警察的摩擦日益频繁。摩洛哥裔的著名作家塔哈尔·本·杰伦指出，外来移民孩子考入大学的比例仅为 4%，而与之对应的欧洲裔法国家庭孩子考入大学的比例则高达 25%。<sup>[15]6</sup>除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之外，私营企业在用工方面也存在隐性的歧视政策。尽管法国实行应聘者提交匿名简历的制度，但在同等学历条件下，“让·皮埃尔”或者“玛丽亚娜”总要比“阿卜杜·卡利姆”或者“萨米拉”更容易在法国企业中找到工作。

事实上，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平等原则存在种族偏见和歧视。年轻一代移民在表面上看并无特殊之处，但实际上还是与欧洲裔的同龄人不同，甚至在社会中遭受更多歧视。要想帮助这些年轻人的确不易，因为法国政府不会根据“少数民族”，即按照公民的“种族文化属性”划分的群体来作出相关重要决定，而是根据公民的“个体”来决定它的政策方针。<sup>[16]17-24</sup>

在法国境内修建清真寺也涉及财政经费的问题。根据 1905 年“政教分离法”，这笔资金不能由法国的公共机关支付。而来自国外的用于修建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的捐款在法国引发争议，人们对法国穆斯林族群与提供资金的中东国家之间关系表示怀疑，这些国家包括科威特、沙特以及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这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巧妙地利用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凭借雄厚的财力在法国扩大他们在穆斯林教众中的影响和威望。既然法国的公权机关无法为法国境内清真寺的修建提供资助，中东富庶的石油强国则不惜血本来填补这一“空缺”，向他们在法国的穆斯林同胞慷慨解囊。而且这些中东国家为清真寺的修建和维护所提供的资金，法国当局却无权对资金总额进行评估和控制。<sup>[17]37</sup>移民同化高级委员会曾指出，一些本来敌对的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却不约而同地向法国穆斯林族群表示友好，其用意在于控制法国穆斯林移民掌管下的协会、清真寺及其电台。

1989 年 10 月 5 日，巴黎远郊克雷伊镇的加布里埃尔·哈维中学的三名女学生因佩戴伊斯兰头巾，被校方开除学籍。这则新闻引发的“伊斯兰头巾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激进的移民同化政策。辩论的范围从清真寺扩展到公办学校，进而渗透到法国的内部事务之中，如法国穆斯林公民的权利与接受法国教育的年轻穆斯林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同等问题。后者其实是年轻穆斯林针对法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存在问题做出的回应，以及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诉求。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是“克雷伊事件”中伊斯兰头巾确实具有象征意义，它引发人们对于两大社会问题的思考：法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问题与政教分离问题。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其结果很可能为“菲特纳”（Fitna）运动<sup>①</sup>提供原动力，从而削弱“萨拉菲”等激进思想在穆斯林族群中的影响。公共场所佩戴伊斯兰头巾，成为显示身份和族群属性的象征，是法国穆斯林作为特殊族群所享有的权利的标志。1989 年 11 月 27 日，国务委员会对国民教育部提交的有关学生佩戴显示其宗教族群属性的标志是否与公立学校内实行政教分离原则相抵触的问题作出了裁定，认为学生的个人自由包括表达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尊重他人自由和文化多元化原则的体现，不会影响教学活动和内容，也不会妨碍学生的学习。不过，国务委员会对这项自由加以限制，即禁止一切有损于其他学生、教师尊严和自由，或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安全及危及公共秩序的强迫、传教和宣传活动。因此，校长们就要担负败诉后受到行政法院惩处的风险，有关公共场所非宗教化的行政权利的规定已失去其效用。<sup>[13]252-258</sup>危机之初，与法国社会党关系密切的反种族主义组织“SOS Racisme”的领导人，以及其他左派组织都认为，三名穆斯林女孩遭到学校开除的原因在于“她们的宗教信仰”，因而将该事件定性为歧视和“种族主义”行为展开的斗争。不过，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SOS Racisme”过去所倡导并流行的“区别的权利”的口号，出于“希贾布”带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而遭到禁止的原因，逐渐演变为主张“权利的差异”。当年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进程也是如此，起初非洲裔和南美裔黑人与进步白人团结起来争取平等权利，后来“黑豹党”等更为激进的团体逐渐登上美国政坛。20 世纪

① 即一种温和的和现代化的伊斯兰运动。

八十年代，法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放弃原有的主张，为那些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法国教育的年轻移民提供了重新伊斯兰化的机会。20世纪九十年代年轻的北非移民逐渐变成极为关注自身伊斯兰身份的穆斯林。他们虽在法国出生，接受法国教育，但仍然无法接受以“政教分离”的名义，禁止穆斯林女孩在法国公立初中和高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法令，他们认为，对同一所学校内佩戴犹太无边圆帽和每周六上午参加礼拜而缺课的犹太裔学生，或者脖子上佩戴十字架项链的基督教学生采取宽容、容忍的态度相比，这对穆斯林移民并不公平。

在“头巾事件”的背后，我们发现事情的发展已改变了最初的方向，当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年轻穆斯林感到他们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潜在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时，无论这种感觉是否明显，他们都会为反抗这种无端的指责而举起捍卫自我尊严的大旗，1991年的海湾战争印证了这一事实。尽管法国表示不赞同美国的“中东战争”，也并未参加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在2001年“9·11事件”和法国参加北约部队进驻阿富汗之后，年轻穆斯林移民的反抗情绪愈发强烈，并有向全球扩散的趋势。1996年本·拉登首先向世界穆斯林发起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圣战”号召。此后，这场“圣战”扩大到对抗欧洲的“新十字军”和“异教徒”，这在法国穆斯林居住区引起极大共鸣，建筑物墙壁上的涂鸦将本·拉登奉为捍卫穆斯林世界尊严的英雄，甚至法国公立中学校园内也出现了这类涂鸦和标语。为加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sup>①</sup>的特殊联系，“基地”组织逐渐将它的活动范围扩展至法国邻近地区，绑架人质事件随之频频发生。2010年8月，一名78岁高龄的法国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尼日尔遭到这一组织的绑架后被杀害。同年9月，在法国参议院批准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穿伊斯兰罩袍的法令后两天，数名参与尼日尔铀矿开发的法国专家遭到劫持。

## 结语

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多元性原则将伊斯兰教定义为一个特殊的族群，要求保障其作为族群的集体共同利益。但在很多人看来，它违背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基本理念。因此，法兰西共和国开始重新确认其历史渊源的“世俗化”性质，以及从法国大革命中继承而来的政教分离原则。从现实角度来看，伊斯兰头巾所引发的立法和司法争论似乎属于个案。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如今的广告宣传和媒体中裸露身体早已司空见惯。在这样一个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的现实社会中，既然放纵和裸露癖的行为都可以被接纳，再去争论佩戴伊斯兰头巾是否合法则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伊斯兰头巾以及之后的伊斯兰罩袍，并不是简单的服饰，而是某个族群要求承认其共同身份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但在“唯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中，上述要求却无法被接受，因为共和国的建立基础并不是“社群中的最高社群”。穆斯林妇女提出享有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诉求，无论她们出于真心还是受到利用，都是基于“平等的国家”和民主原则，而反对“干涉者的国家”。无论她们有能力捍卫信仰，还是自己决定佩戴头巾或罩袍，只要不是她们的父兄出于宗教目的强迫的结果，就可以认为她们如此穿戴只不过要表明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佩戴何种饰品只是个人权利而已。简言之，既然政教分离早已成为公认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基本原则，那就没有必要以颁布法律的方式加以确认和强化。

## [参考文献]

- [1] 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M]. Paris : Grasset, 2002.
- [2] Alfred Grosser. *La France, semblable et différente*[M]. Paris : Alvik Editions, 2005.

①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这一恐怖组织主要依靠勒索赎金获取经费，同时它招募新成员的效率之高令人称奇，并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伊斯兰极端思想。

- [3] Voir Patrick Weil et Randall Hansen, dirs. Nationalité et Citoyenneté en Europe [M]. Paris : La Découverte, 1999
- [4] Alain Juppé. Les cahiers de France moderne [EB/OL]. [2006-10-02].  
<http://www.France-moderne.asso.fr/Cahie>.
- [5] Voir Edouard Behr. The Algerian problem [M].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61.
- [6] Alfred Grosser.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M]. La Croix, 1961.
- [7] Tahar Ben Jelloun. Hospitalité française. Racisme et immigration maghrébine [M].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1997.
- [8] Vincent Viet. La France immigrée. Construction d'une politique 1914-1997 [M]. Paris : Fayard, 1998.
- [9] France, race and immigration. Who gains? [J]. The Economist, 2002-03-02.
- [10] France.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 Les étrangers et l'emploi :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1992-12  
 Collection des rapports officiels :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Paris, 1993.
- [11] Patrick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L'aventure d'une politique de l'immigration de 1938  
 à nos jours [M]. Paris : Collection: Folio/Actuel: Gallimard, 1991.
- [12] Gilles Kepel. À l'Ouest d'Allah [M]. Paris : Collection L'épreuve des fa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94.
- [13] Emmanuel Todd. Le destin des immigrés. Assimilation et ségrégation dans les démocraties occidentales [M]. Paris :  
 Collection L'Histoire immédiate, Éditions du Seuil : Paris, 1994.
- [14] Patrick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M]. Paris : Gallimard, 1999.
- [15] A Survey of France. A question of colour, a matter of faith. France must face up to its immigrant problems [J]. The  
 Economist, 2002-11-16.
- [16] Ignacio Ramonet. Minorités, nation et République [M]. Métamorphoses d'une utopie : Le pluralisme ethno-culturel  
 en Amérique : un modèle pour l'Europe ?, Jean-Michel Lacroix et Fulvio Caccia, dirs. Paris : Presses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 Montréal : Éditions Triptyque, 1992.
- [17]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 Liens culturels et intégration :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1995-06 [M]. Paris :  
 Collection des rapports officiel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5.

##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rench Model of Immigrants from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France**

**Dominique MAILLARD**

**Abstract** Local seasonal migrations have long been common in France, and the migrations can be throughout the whole Europ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uch migration in European countries trace back to 1805 under the Napoleonic Empire regime, when nationality was based on right of blood with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ensuring sufficient recruits in the Napoleonic armies, which is unlike the Republican France today that defines nationality on the basis of right of the soil, also known as birthright citizenshi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immigr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French domestic policy,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issues of public safety, national identity,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by the secular, republican French model. The migration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 Europe demonstrates four conceptual issues: European residents' country of origin, French nationality, the exercising of French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rson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a more and more complex family ethnic composition after the restructuring.

**Key Words** Muslims in France;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slamic Studies; Middle East and Europe ; Migration Studies

(责任编辑: 杨 阳)